

教育·社会·人

JIAOYU SHEHUI REN

日本的近代化与教育

作者/陈晖

封面设计/倪天煦

版式设计/刘宝华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六〇三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7.625 字数/155,000

版次/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47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081-4/G·13

定价 3.50 元

VV18A80

· 目 录 ·

第一章 近代化与教育概说	1
第一节 西方学者的近代化理论	1
第二节 看待教育与社会近代化的视角	10
(一)经济学家论教育对经济 发展的贡献	10
(二)社会体系的近代化与教育 体系的近代化	13
第二章 日本接受西方教育制度的 土壤	18
第一节 日本接受外来学术及教育的历史	19
第二节 日本前近代教育思想家	27
第三节 日本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制度 的可能性	32
第四节 近代教育体制的雏形	41
第三章 明治教育的遗产	51
第一节 发展教育,政治先行	51
第二节 初等教育与社会	53
(一)明治政府重视初等教育	53

(二)近代化与小学教师	56
(三)初等教育的资金来源	59
(四)初等教育对国民归属意识的培养	61
第三节 高等教育与社会	64
(一)近代人才观与价值体系的缔造者 ——福泽谕吉	64
(二)高等教育模式的探索	68
(三)近代化的起飞与人才培养	72
第四节 《教育敕语》与近代化受挫	75
第四章 社会变迁与教育	80
第一节 战后民主改革与教育	80
(一)战后改革的原因与条件	80
(二)战后改革措施与成效	81
第二节 民主与教育	85
(一)杜威教育思想与日本人教育 实践的结合	85
(二)左右日本教育的力量	90
(三)国家公务员制与教育	94
第三节 经济高度增长之谜	98
(一)战前的遗产	99
(二)战后问题研究会——知识分子 在战后经济复兴中的作用	102
(三)知识分子——战后近代化 的承担主体	107
(四)经济计划与教育计划	117
(五)中小企业的熟练工人—— 街道工厂的技术	123

第五章 产业与教育	127
第一节 企业内教育与企业的人才观	127
(一)日本企业内教育的若干特点	128
(二)丰田汽车公司的企业内教育	132
(三)企业的人才观,企业如何看 学校毕业生	137
(四)企业与学校的接点	138
第二节 当代学校教育	140
(一)当代高等教育	140
(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143
(三)高中与高中生	145
(四)初中与初中生	152
第六章 一个社区的教育考察	160
——福岛县教育见闻	
(一)日本农业现代化与教育	161
(二)喜多方市教育考察散记	167
(三)介绍两所职业高中	171
(四)小学教育考察散记	174
第七章 人与社会	180
第一节 日本人的社会化	180
(一)家庭	181
(二)学校	185
(三)大众传播工具	193
(四)阶级	197
(五)同辈群体	205
(六)社区	209
第二节 人格理论与日本人的人格形成	212

• 第一章 •

近代化与教育概说

第一节 西方学者的近代化理论

西方学者(包括日本学者)将近代化视为由于科技进步而导致的自觉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一思想理论渊源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合理化)、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杜尔克姆)的“社会分工论”和汤尼斯的“契约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们普遍认为近代化是欧洲发生的一种历史现象。近代化(modernization)是指人和社会从前近代状态向近代状态过渡的过程。近代化的内容往往依据变革主体对前近代认识的程度不同而异。韦伯认为近代化是合理化的同义语。从人类历史上看,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包括三个层次:产业、劳动的合理化,目的价值合理化的实践,要求社会承认自己行为正常的心理防卫机制。韦伯还提倡实

行近代官僚制度，认为普及国家公务员制是衡量近代化的标准。

官僚制度亦称文官制度，西方国家的文官并不等于军官以外的官员，它包括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大量工程技术人员、教师、一般职员和打字员、勤杂工等。而国会议员、政府首脑、行政各部的负责人、法官等官员却都不在文官之列。今天西方各国的文官制度，有以下几个带有普遍性的重要特点：(1)法制化。官员只对法律和法定职权负责，文官行使权力和执行任务，都必须有法律依据。(2)实行功绩制。它包括两个方面：公开考试，择优录用；严格考试，论功行赏。(3)用人注重知识和专业。(4)规定“政治中立”，实行职务常任。(5)进行科学管理。(6)讲求职业道德。

6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用多元的近代化论代替一元的近代化论(产业化论)。近代化的内容包括了城市化，大众传播工具的普及化，教育的普及化，人际关系、价值体系的变化等。

60年代以美国社会学家W·穆尔和M·J·利维为代表的近代化理论出现，近代化理论才开始面向非西方、后发展近代化的国家。

W·穆尔认为，近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欧美型经济富裕、政治稳定的社会过渡的变迁过程。产业化是其第一步。近代化是产业化的结果。他认为产业化有以下4个条件。

(1)价值：社会必须把重视血缘、私人家族的观念转换成重视一个人的成就、功绩方面来。此外，用爱国主义民族自尊心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步调也是极必要的。

(2) 制度:使土地、资本有效地服务于经济生产,建立劳动力流动的劳动市场和产品流通的商品市场。

(3) 组织:建立金字塔型专业化的现代官僚制组织,建立适应国家需要的财政组织。

(4) 公民的积极性:培养有创造性的改革家,使人们追求新的成就,有上进心,有求知欲,对教育有较高的要求,有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的愿望。

穆尔还抓住现代社会的特征指出了产业化给社会带来的如下影响:

(1) 经济方面:出现有高度技术水平、受过高等训练的专家的经济组织,形成规模大、产品商品化的相互依存的市场系统。

(2) 人口结构方面:工业化初期死亡率下降,出现人口增长;随后是人口出生率下降,随着工业化成熟和计划生育普及,人口增长得到控制。出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高龄化人口结构。

(3) 社会结构:亲族集团及家族的机能缩小、解体。个人主义化增强、女性地位提高、社会控制能力降低,人与人之间缺乏关心,产生异化。

此外, M·J·利维还把近代化社会与没有近代化的社会做出比较,提出了下列八项指示:

(1) 近代化社会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教育组织的专门化程度高;而非近代化社会的专门化低,分工不显著。

(2) 近代化社会分工明确的各级专业化组织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而非近代化社会缺乏各级组织的明确分工,人们

往往依靠亲族集团和近邻社区强大的力量解决实际问题。

(3)在伦理上,近代化社会是照章办事,采取公平竞争主义,而在非近代化社会中,家族第一伦理占主导地位,亲族的社会关系优先受到照顾。

(4)近代化社会中,国家权力是中央集权的,但并不专制;而非近代化社会即使是分权的,权力的性质也是专制的。

(5)近代化社会中社会关系的模式是理性主义的,一视同仁,人际关系的机能是被限定的,感情是中立的;非近代化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是传统主义的,重私人感情,人际关系的机能不被限定,是一个低效率社会。

(6)近代化社会的信息交流渠道畅通,商品经济发达;而非近代化社会则落后。

(7)近代化社会有发达的现代官僚机构;而非近代化社会即使有官僚机构,也是低效率的,因为它是建立在掺杂私人感情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的。

(8)近代化社会的家族组织日益核心化(小型化),家庭机能缩小;而非近代化社会家族结构多样,具有多种机能。

利维还认为,所有社会,无论它们的起点多么不同,在近代化过程中,都会经历大体相同的变化,即工业化、城市化、官僚制化,以及政治决策上的中央集权化等过程。另一种说法是工业化、社会流动化、政治民主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化。因此,只要达到同样程度的近代化,就会使社会的制度结构产生某种趋同现象。这便是六十年代风行全球的近代化趋同论。^①

近代化趋同论的理论根据很简单。利维认为,近代化的

方式本身对任何国家都会有强烈的吸引力，非近代化社会与近代化社会接触之际，一定会受到近代化社会的影响，而近代化社会绝不会因此而受损失，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个人组成的，而任何个人都不拒绝享受近代化带来的恩惠。他认为，搞近代化的方法并不复杂，发展中国家用上述8项指标既可预测本国工业化的前景，了解近代化的进程，也可分析近代化受阻的原因。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美国人60年代提出的近代化理论模式虽然对近代化的一些现象做了描述，但不能称为严密的理论。

在石油危机之后，资本主义近代化遇到了难题。第一，发达国家通过石油危机认识到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经济无限增长的神话已经破灭。第二，欧美发达国家近代化出现了内部危机，随着阶级矛盾加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范围更广泛、内容更深刻的对立。劳动力素质普遍下降。英美等国虽然教育得到了普及，但是由于激烈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下降，旷工、罢工、偷工减料、对新技术抵制等，都导致生产率大大降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模式是否能成为全球每个角落的现代化的目标？这引起了人们的深思。

第三世界的现代化道路也并不一帆风顺，现代化过程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国际、国内的重重阻力。从客观形式和现实来看，资本主义工业化兴起时代的充裕条件早已过去，发展中

① [美]利维：《近代化与社会结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38—122页。

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可能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在今天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投入资本主义体系,那只能成为垄断经济圈的附庸国。提供初级产品的经济附庸国成为帝国主义控制的对象。特别是在石油危机以后,帝国主义只有牺牲第三世界各国的利益才能进一步得到发展。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力一般都处于前近代即资本主义以前的水平上,因此封建经济的基础比较牢固,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高,以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体系往往对现代化起着拖后腿的作用。光引进外国的技术是不行的。这便使人们逐步认识到现代化不单单是一个技术革命和经济增长的过程,而是一个科技、教育、经济、政治和社会协调,全面发展的过程。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在近代化过程中,有成功,也经过挫折。

日本近代化或称非西方后发展国家近代化应具备哪些条件呢?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长期进行近代化与近代化受挫理论研究,他的看法概括起来讲有如下4点。^①

(1)对传统文化的危机意识。

日本人民在明治维新后对本国传统文化抱有强烈的危机意识,这样才使“开国进取”、大量引进西方文化变为可能,它使日本迅速地摆脱了落后挨打的局面。幕末的知识分子会泽正斋、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等人对日本人民的启蒙作出了贡献。维新前后,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敏锐地意识到,门户开放

^① 富永健一:《近代化理论的今日课题》,日本《思想》杂志1985年4月号。

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如果把民族热情引导到学习西方上来,将会使日本产生积极的前所未有的变革。革新的直接动机是“倒幕开港”。美国的炮舰撞开了日本领国的大门,腐败的幕府藩政财源拮据,无力抵抗,德川幕府业已成为改革维新的绊脚石。“尊王攘夷”的口号,从字面上看是传统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但是,正如列宁所评价的那样,明治维新是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范畴的历史事件,明治维新的一切改革的完成,同时也是近代日本民族完全形成和取得民族独立的过程。^①所以,它符合了穆尔近代化理论中关于价值观念变化的条件。也就是用民族意识来加强日本人民的凝聚力。

(2)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近代化,必须靠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主持中央政府,在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条件下,自上而下地逐步推行工业文明。非西方、后发展国家本身没有产生工业文明的主体条件,政府必须由推进近代化的精英从中央先导性地自上而下地引进工业文明,并使之在本国生根开花。

日本明治维新时推进近代化的领导人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下级武士和知识分子,近代资产阶级实业家队伍只是在维新之后才出现的。在维新领导集团中,象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先进的知识分子是近代化的促进派;而下级武士出身的西乡隆盛则是反对派。在明治初期政府中,始终存在着斗争。近代派曾组成岩仓使节团,去欧美考察一年零九个月。他们考虑如何在国际环境中进一步推动近代化问题;而西乡则代

① 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65页。

表对近代化不满，企图恢复传统社会的旧的士族的利益，维新成功后不久企图挑起内乱。两派借征韩这个题目展开了大斗争。斗争的结果，大久保派以天皇的名义否定了西乡的主张。其后西乡发起西南战争，向政府问罪，被大久保挫败，明治政府成了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推进近代化革新势力的政权。当明治维新的三位主要领导人大久保、木户、西乡相继去世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等第二代人物登上历史舞台，明治政府及时防止了国内的分裂，对日本的近代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3) 非西方、后发展国家近代化的第三个条件是造就能承担工业化、消化外来的工业文明的人才，这是指工程技术人员，有一定资本能力、经营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实业家、熟练工人，有购买能力并形成消费市场的消费者。支持企业活动的各阶层人士。这些人才可以说是产业化内部成熟的条件。政府主导虽然重要，但国民中不大量涌现产业化所需的人才，近代化是决计不能成功的。日本的产业化获得成功，其原因之一是从旧武士层、农民、商人中出现了各类实业人才。

(4) 逐步克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两重对立结构，缓解农村保守意识与城市西化倾向之间的冲突，最终融为一体，求得稳定发展。上述对立和冲突在德国与美国曾经出现过，对非西方国家来说，这种矛盾是必定会产生的。搞近代化就要引进外来的工业文明，但是在一部分思想狭隘的人心目中，开国进取似乎不大必要。这两种意见的冲突解决不好，近代化势必受挫。

在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到 1945 年日本战败，近代派与

传统派的对立始终存在。近代派的代表人物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大久保利通先后被暗杀。传统派向近代派的挑衅事件也层出不穷。战前的近代派是亲英美、崇尚西洋的，主要阶层分布在大城市，大多为大企业员工，知识分子。传统派则多分布在农村，由自营主和非知识阶层构成。由于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各阶层所得到的恩惠不同，所以对近代化的态度也不一样。大城市、大企业的熟练工人从近代化得到较多的好处。二十世纪初叶，日本农村的大地主普遍变成所谓“寄生地主”即地主兼资本家。广大贫农主要是佃农，靠租种地主的一小块土地为生，几乎不能维持生计。他们为了活命，不得不外出做工，力求增加一点收入。他们已经变成了半无产者，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双重剥削。农民子弟成为日本陆军的兵源，充当了法西斯的炮灰，农村成了反工业化、反西方的温床。在战前的日本，这种双重对立结构始终没有消除。战后民主改革消除了这种双重对立结构，才带来了战后经济高速增长与近代化的成功。

从上述可知，第三个条件与第四个条件是非西方、后发展国家实现产业化、推进近代化的内部条件，是极为重要的。

1960年欧美各国学者在日本箱根召开了“关于近代日本”的讨论会，研讨了战后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模式。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约翰·霍尔提出了以下7个特征：

(1) 人口向城市比较高度地集中，以城市为中心的色彩浓厚。

(2) 高度、有效地利用无机能源——石油，商品广泛流通，服务业发达。

(3) 交通、通讯手段先进,社会成员交往方式多样化,能在广泛的范围内多渠道的交流,人们对于经济、政治问题采取积极参与的态度。

(4) 读写能力普及,在此基础上对科学技术普遍产生兴趣。

(5) 形成了有广泛外延的,具有强大渗透能力的大众传播工具网络。

(6) 具有大规模的社会设施(如政府机关、流通机构),建立起近代官僚制组织原则。

(7) 均质人口,单一民族国家,社会具有凝聚力,对外开放,扩大国际交往。^①

第二节 看待教育与社会近代化的视角

(一) 经济学家论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取得经济发展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比如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技术革新、安定的政治环境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再丰富,也要靠人去开发,机械设备也要靠人发明、改造、操作。生产管理、科学管理也需要有较高知识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力资源开发并不是指对少数精英的培养,而是指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在这个问题上,历史上许多经济学家与教育学家都有过很明晰的论述。

^① 约翰·霍尔:《日本近代化概念的变迁》,岩波书店1968年版,第8—9页。

1. 教育投资是一种根本性的投资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在一个社会中，人取得公民权是有一定条件的即他应该有一定能力，为此他必须学习，而学习是要消耗金钱的，这笔钱应视为一笔投资。一个人的技术不仅是他本人的资本，也是社会资本。普及初等教育、训练熟练工人的投资是可以伴随利润一起被偿还的。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1842—1924年)在《经济学原理》的《生产要素》这一章中指出，用公共资金与个人资金投入教育中，给予一般大众平等教育的机会，是一种根本性的投资。因为除了土地、劳动、资本三要素外，为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进行人力投资。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1883—1950年)对人力投资理论的研究集中在生产要素之一“劳动”上，他把劳动分为脑力、体力两种，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是创造性劳动，应重视培养知识分子，即生产活动中起指导作用的人。他的理论对此后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全美经济协会上谈到教育投资论时指出：“有一种论点认为，劳动不需要知识与技能，劳动者的能力没有高低之分，这种论点即使在古代也是不能成立的，今天就更加荒谬了。”舒尔茨认为，“美国生产的增长仅有1/5来自设备的改善，其它4/5来自生产方法、管理、劳动者素质的改善”。

关于对教育投资效果的评价，索伦 (Robert, M. Solon) 认为，经济发展的10%是来自人口与自然资源，其它90%来

自技术革新与人的素质的提高。米塞尔(Dr. Mussel)对美国教育投资效果的评价及欧·奥古斯特(O. Aukrust)对1900—1950年挪威经济增长的实地调查结果均证明索伦的结论是正确的。英国经济学家瑞达威(Reddaway)与史密斯(Smith)对1948—1954年英国制造业的投入产出进行的计算结果,也与索伦的结论相符。总之,技术革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可低估,而技术革新要依靠教育培养的人才。那种认为劳动就是体力劳动,教育则是士大夫等有闲阶级才有权享受的旧观念应该改正。教育是一种根本性的投资,受过教育的人是社会的资源,在一个社会中人人都应从教育中得到好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应逐步消除。

据日本文部省1963年的估算,从1905—1960年国民收入增加的情况看,教育的确是社会资本的一种投资,是经过训练的劳动力的供给源。教育投资的增加比劳动力、物质资本快。对国民总收入而言,教育投资竟为国民总收入的2.3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府为教育花了很多钱。政府投资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明治)、3—4%(昭和)、5—6%(战后)。企业给教育的投资不如给设备的投资多。除了明治时期外,国家对教育的投资总是少于家庭对教育的投资。关于教育投资的收获,据日本文部省1967年统计,日本国民总收入的增加,25%是来自教育投资。总之,教育是一个长期的生产过程,其产品比工业产品寿命要长得多,对于教育的投资,政府应该舍得花钱,同时也应动员社会力量,家庭力量把更多的钱用于教育。

2. 通过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

不少经济学家与教育学家指出,对发展经济来讲,最重要的教育部门是初等教育与职业训练两大部分。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指出,人的一般能力是依靠青少年时代的基础教育培养的。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还应加强企业的职业训练,提高职工的能力,特别要学习获得知识的方法。

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川田寿先生指出,对青少年进行正规的义务教育和进行各种企业内教育以及由各种学会团体对其成员进行能力开发,是极其重要的。

教育学家哈德兰·拉塞认为,从表面上看,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并不密切,但实质上是休戚相关的。受过义务教育的人比文盲更能承担起做好工人、好公民的责任。教育的效益就是提高生产率。

教育学家拉瓦瑞指出,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可以说只有在初等教育普及后才能实现。他建议教育决策者应好好调查本国人力资源,在考虑本国经济发展时合理分配人才,合理利用各种劳动力,以适合社会需要。

(二) 社会体系的近代化与教育体系的近代化

社会体系在权力、财富、政府的影响力、价值义务承诺方面对教育体系进行投入、产出,社会体系的近代化促使教育体系近代化。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在关于社会体系的模式变量理论中阐述了他的近代化的理论模型。帕森斯认为,近代化是人们有计划地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化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他把传统的农业社会和近代化的工业社会作为两个极端模